

# 中西视角下对我国协商民主的思考

张文敏

(中共怀化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 湖南 怀化 418008)

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和制度设计,更是一种实践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在中西方兴起。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论述是中国民主政治道路的表达。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论述,既有对民主的具体实践,又结合国情体现了我国人民至上的政治诉求,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协商民主本质上是区别于西方的话语体系的。本文试着从协商民主的内涵、渊源、属性、功能及发展前景等几个角度对中西方协商民主进行对比思考,进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解和认识。

## 一、对协商民主的概念界定不同

西方协商民主包含着“审议”、“慎思”和“讨论”等内容,是指公民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基于权利和理性,通过讨论、辩论等方式,结合一定的主题进行,最终形成合法决策的整体过程。而中国协商民主则与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密切相关,有着与之相关联的特定内涵,主要指行为主体围绕着政治,社会生活中的议题,通过咨询、商议、讨论的方式达成共识的一种民主方式,内涵比西方的要更加丰富和具体。党的十八大以前,我们一直有协商民主这一概念,但其内涵上,并没有太鲜明的中国特征的印记。十八大首创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重要概念,而且我们我明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必须有自己的核心概念作为支撑。2015年在《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作了权威解释,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这一明确定义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做了根本区分,中国的协商民主大前提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根本特征。对协商民主地位和重要性的定义方面,强调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是和选举民主同等重要的一种民主范式。在协商民主的主体要素上,强调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协商民主议定内容方面,强调“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是协商民主的重点内容。这些从概念上界定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地位,突出了协商民主的社会主义特质和中国特色。

## 二、对协商民主的渊源判定不同

西方协商民主源头在于希腊时期的直接民主传统。到近现代后,西方民主深受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批判理论的西方文化影响,加上西方不断反思其选举民主的利与弊,从而逐渐形成其今天的民主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背

景和发展道路,内生性是其产生和发展创新的原始动力,中西民主形成的条件和背景想去甚远。党的十八大之前,国内学者解读和研究中国协商民主实践时,主要是运用西方协商民主的范畴和理论来论证,以至于在协商民主的渊源上有了“舶来品”与“内生论”等争论,这样的争论严重影响了对中国协商民主生动实践与鲜活经验的总结。事实上,中华民族“尚和合”的优秀政治文化,“求同存异”与“共存共生”的博大胸怀,是我国协商民主孕育和形成的独特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团结救亡的“三三制”政治实践和协商建国等成功的政治活动及政治经验,这些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的坚实历史基础。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诉求和统一战线理论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些都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特征和内生性,基于此关于“舶来品”与“内生论”的争论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鲜明的内生性,深刻论证了其“有根、有源、有生命力”在于其独特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这一新论断,不仅廓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渊源的重大差异,而且深刻揭示了其内生性逻辑,构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话语表达的生命线。

## 三、对协商民主的属性表达不同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然而我们过去很少把它当作民主的一种运作形式来看待,更缺乏将群众路线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高度去加以认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缺乏制度化的载体,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主要取决于领导者的工作作风,或者以非制度性的方式推行,这些都是对群众路线的偏离。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新论断,首次将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融为一体,升华为一种落实协商民主的实践模式,从民主制度建设和民主运作形态的高度看待党。群众路线将其纳入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范畴,这不仅是党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新的政治内涵,而且从制度上激活了党的群众路线,使其有了有效的抓手。这一新定性从民主形态的高度看待群众路线,将群众路线转化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制度和程序性制度体系,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的内在联系,使协商民主成为落实群众路线的重要制度载体,彰显了协商民主的本质,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

## 四、对协商民主的功能概括不同

中西协商民主的政治功能存在根本不同。西方协商民主主要是对选举民主进行建设性的补充与完善,追求的是民意的代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有实现稳定有序政治参与

的功能,也有促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升党的执政效率、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有效治理,达到决策的合法性的功能,显然二者的政治功能不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其深刻的实践价值,深刻阐释这些实践价值则可以打消对协商民主的疑虑和争论。2014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的重要作用。2015年,在《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意见>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论证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有利于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作用。这些重要论述全面阐释了协商民主在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价值。这不仅打消了少数人对发展协商民主的顾虑和争论,为“为什么”发展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而且也从功能上概括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西方协商民主功能的差异。

#### 五、对协商民主的发展战略布局不同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其政治效能是否能得到真正释放和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现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协商就要真协商”。西方的协商民主作为资本主义选举民主的一种补充,主要集中于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社会事务的对话协商,不是要创造民主政治的另一种形式。中国的协商民主则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不仅包括政治协商和党际协商,而且涉及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许多领域,并在若干领域已从理念上升为制度安排,中西方协商民主在性质地位、协商领域和发展程度上有重要区别。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深入发展,习近平强调,要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战略任务,明确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作为协商民主建设的目标。首先要加强协商重点,积极“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

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等七大发展渠道。其次要构建制度化、程序化、法制化的协商运营机制,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确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实在在的”。这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诠释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民主的技术文明层面,更涉及民主的实践模式,它们为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建设框架提供了基本遵循。

#### 六、协商民主的目的要求不同

目标诉求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要达到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西方的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一种弥补措施,实质是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是权力利益较量和分配的竞争过程,追求的是民意的代表性,而不是真正为了实现民意。而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换言之,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寻参与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公约数本是一个数学术语,在政治学上可以引申为“求大同”及“最大共同利益”。寻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就是求“最大共同利益”的过程。在社会政治领域,在利益多元、价值取向多样、地区发展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的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最核心的就是要民事、民意、民决。协商民主能够最大限度的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既能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能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通过协商,可以确立利益共同点和最大公约数,促进“最大共同利益”的形成。把“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真谛,是习近平给予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多元化的现实而提出的,这就是我国协商民主的目标诉求。这一论断在理论上发展了毛泽东“商量政府”的思想。在实践中要求广纳群言,真正做到“有事好商量”,把民主落到实处。这样的定位既彰显中华民族天下为公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也体现协商民主的民主本质。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探索,如何使这种制度的优势及民主特质充分体现出来,如何使生活其中的民众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其优越性,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追求的目标。

#### 作者简介:

张文敏,历史学硕士。现任怀化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师,主要从事红色文化及协商民主研究。